

923661 3
1177
199
199
1177
2210
Keywords

關鍵詞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作者：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譯者：劉建基

導讀 李有成 (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兼所長)

關鍵詞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修訂版)

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著
劉建基 譯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Copyright © 1976 · 1983 by Raymond William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pper Collins,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 一版。-- 臺北市：巨流，2003 [民 92]

面： 公分

譯自：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ISBN 957-732-185-2 (平裝)

1. 英國語言 - 詞源 2. 社會語言學 3. 文化 - 字典, 辭典

805.121

920121468

關鍵詞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原著：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原著者：Raymond Williams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譯者：劉建基

封面設計：林宏銘

編輯部：106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8369139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撥：郵政劃撥帳號41299514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185-2 (平裝)

2004年2月初版二刷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廣告回函
臺灣南區郵政管理局
登記證第1391號
郵資已付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收

Kaohsiung Fu-Wen Publishing Co.

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麗文文化事業(股)公司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駱駝出版社

導 讀

《關鍵詞》與威廉士的「文化與社會」方法

李有成（中研院歐美所所長）

1939年10月，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靠著一份政府獎學金，離開威爾斯的老家來到劍橋大學，在三一學院研讀英國文學。威爾斯工人階級的文化與劍橋大學的文化當然大不相同，這一點威廉士終身感受深刻。兩年後，他被徵召入伍。在軍中四年，就在1945年10月中旬，正當他準備被派赴緬甸的時候，一天早上突然接到退伍令，要他回到三一學院繼續未竟的學業。第二年6月他從劍橋大學畢業，同時獲得一份研究所獎學金。威廉士並沒有繼續深造，他接受牛津大學的聘書，到牛津大學的成人教育班任教。等威廉士再回到劍橋時，已經是十五年後。那是1961年的春天，他收到劍橋大學的一封信，劍橋有意聘他為英國文學講師。其實他並不知道有這個職缺，因此根本未向劍橋大學申請。威廉士重返劍橋後，第一次正式認識李維思（F. R. Leavis）。其實早在1945年威廉士退伍回到劍橋時，就結交了一批環繞著李維思的年輕人，不過當時威廉士與李維思私下並不認識，自然也沒上過他的課，畢業之前也只聽過他一次演講。1961年威廉士變成了李維思的劍橋同事，第二年，李維思即從劍橋大學的唐寧學院（Downing College）退休。威廉士對他非常敬仰，兩人雖然嘗試交談，但似乎話題不多（Williams, 1989: 12）。

李維思——還有瑞恰慈（I. A. Richards）和燕卜蘇（William Empson）這兩位師生——是建立現代英國文學批評的扛鼎人物。李維思基本上是位文化保守主義者，在意識形態上與威廉士大相逕庭，

但威廉士自承深受他的影響（1989: 12）。不只威廉士，許多當時的英國左派年輕學子都為李維思所吸引，因此被稱為左派李維思追隨者（Left Leavisites）。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新近出版的自傳中，這樣記述李維思對當時英國左派學子的影響：

……等我來到劍橋的時候，我自己對李維思的激情已經冷卻了，但是在他的世紀裏，沒有一位學人在文學教學方面產生超過像他那樣的影響。他有一種令人敬畏的能力，啓發未來世世代代的教師，這些教師又回過頭來啓發他們才情洋溢的學生。（2002: 94-95）

霍布斯邦甚至指出，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往往是因為對文學的激情而逐漸走上歷史分析的道路的。「這也許有助於解釋，何以反馬克思主義的李維思反而帶給許多後來成為共產黨黨員的人令人訝異的影響」（97）。

李維思雖然和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對資本主義沒有好感，但雙方的出發點完全不同。對李維思而言，當代社會的危機在於社會的精神與文化層面，而非物質層面。他所嚮往的是產業革命之前井然有序的有機社會，也就是所謂的鄉村英國（rural England），可惜這樣的社會早已毀於產業革命——包括產業革命所帶來的金錢崇拜，以及讓中產階級自得其樂的物質主義。最後殘存的文學與文化也面臨大眾媒體、通俗文化及都會流行文學的威脅。李維思在1930年出版了一本題為《大眾文明與少數人的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的小冊子，對當代英國文化的遠景抱持著相當悲觀的態度。當瑞恰慈還心懷憧憬，以為文化也許會有否極泰來，緩慢提升的機會，李維思則認為文化正不斷向下沉淪，瑞恰慈的希望因此顯得不切實際，因為

他看不到任何扭轉局勢的因素（1930: 31）。李維思並在1932年創辦了《探究》（*Scrutiny*）季刊，印行了二十一年，至1953年停刊。《探究》所揭櫫的大抵為李維思的文化保守主義，對當時英國的文學馬克思主義頗有微辭，這份期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影響現代英國文學批評至鉅。

左派李維思追隨者基本上排斥李維思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但卻認同他的批評語彙中的激進成分；李維思的激進文化保守主義正好可以補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不足。威廉士雖然遲至1961年才與李維思認交，但他自劍橋畢業，一出道就是位左派李維思追隨者。1947年至1948年間，威廉士與友人合辦了一份生命很短的刊物，叫《政治與文學》（*Politics and Letters*），企圖結合文學分析與社會和政治議題，《政治與文學》即被視為一份左派李維思追隨者的刊物。

威廉士的理論方向是相當個人的。在一個文學與文化理論因意識形態路線而深深兩極化的時代，他所仰賴的是馬克思主義和《探究》，避開了馬克思主義者以經濟決定論閱讀文學文本，乃至於李維思追隨者對少數人文化命運的狹隘關懷，以及對群眾的反感。（Dworkin, 86）

雖然威廉士也和李維思那樣，對大眾文化的腐蝕效應憂心忡忡，然而他不僅關心大眾文化帶給文學價值的威脅，更擔心大眾文化對工人文化的荼害。

威廉士的左派李維思追隨者的立場充分顯示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一書。《文化與社會》——以及出版於1961年的《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採用李維思所熟悉的實際批評，考察與詮釋英國自產業革命之後至1950年的文化理論與社會進程。威廉士利用李維思的分析方法，探

討兩百多年來英國的文化系統與文化變遷，書中明顯透露了他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嫌惡。從《文化與社會》一書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威廉士在其分析活動中特別強調社會進程的總體性：這是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突出生產工具與生產關係很不一樣的地方。威廉士的分析方法後來即因此書而被稱為「文化與社會」方法。

《文化與社會》的出版正值英國新左派（the New Left）運動相當活躍的時候。新左派的蓬勃發展主要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本身原就是一個非正式、也缺乏嚴格組織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活動，成員相當龐雜，有反核武份子、工會左翼激進份子、反制和反文化的學生與藝術家、脫黨或退黨的共產黨員、工黨的異議份子，以及學院中的激進知識份子。新左派在意識形態上無法勾同英國共產黨與工黨極左派所堅持的經濟決定論，並自視其政治立場為一種社會主義的人文主義（socialist humanism）。「他們賦予文化與藝術特殊的地位，因為這些實踐是整體人生不可或缺的，同時也因為文化機器和建制在人的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Dworkin, 61）。

在論述與批判活動上，環繞著新左派運動的有兩個鬆散的知識團體，這兩個團體又以兩、三份期刊為中心。其一為《思考者》（*Reasoner*），創刊於1956年7月間；第二年夏天改名為《新思考者》（*New Reasoner*），副刊名即標明這是一份社會主義的人文主義刊物。《思考者》與《新思考者》的編輯委員和投稿者多為前英國共產黨黨員，包括小說家萊辛（Doris Lessing）、歷史學家湯姆森（Edward Thompson）、藝術批評家柏格（John Berger）、哲學家麥英泰（Christopher MacIntyre）、政治學者密利班（Ralph Miliband）等。《思考者》與《新思考者》旗幟鮮明，批判史達林主義不遺餘力，同時對蘇俄於1956年入侵匈牙利一事極為憤慨。在意識形態上這些左派知識份子想要召喚的是以莫禮思（William Morris）為主的英國激進主義——一種未被污染的英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與實踐——以及馬

克思的批判與歷史方法。

和《思考者》與《新思考者》的成員比起來，《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的成員比較年輕，他們大部分為牛津大學的學生，二十幾歲的年齡，既未曾經歷經濟大蕭條的歲月，二次大戰時又還很小。1956年蘇俄侵略匈牙利對他們是一大打擊，同年英國介入爭奪蘇伊士運河的事件，也令這些左派年輕知識份子深感氣憤。像當代加拿大著名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霍爾（Stuart Hall），當時都是《大學與左派評論》的靈魂人物。這份刊物也是創刊於1956年，對戰後資本主義與美式大眾文化的擴張力加批判。《大學與左派評論》有時候也被視為文化論者的刊物，其成員同樣反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在他們看來，社會進程受制於政治、經濟及文化活動，這些活動並無主從或從屬關係。他們尤其視文化為整體的生活方式。1959年12月，《新思考者》和《大學與左派評論》合併為《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由霍爾擔任主編。

威廉士的《文化與社會》一書即是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之下出版的。《新左派評論》的編者在此書出版二十年後訪問威廉士時指出，此書「對本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解放的角色」（Williams, 1981: 106）；威廉士自承，雖然在一九五〇年代他仍參與若干政治活動，可是自1948年動筆撰寫此書開始，他就刻意擺脫任何政治上的糾葛。在他看來，「政治的功能通常……是在例行地複製各種爭議或利益競逐，而與社會基本的深層活動沒有什麼關係」（1981: 102-03）。因此嚴格說來，威廉士並未直接或實質加入五〇年代末期新左派運動的任何陣營：他在年齡上顯然屬於《新思考者》成員的世代，但在知識上與性情上卻較接近《大學與左派評論》的那些年輕人，《文化與社會》一書的部分章節即曾在《大學與左派評論》上發表。一直到《漫長的革命》一書的出版才真正標示威廉士重新參

與政治與文化辯論。

《文化與社會》是一本革命性的書，有意扭轉過去兩百年英國知識界有關文化的論述方向，威廉士顯然胸有磊塊，企圖以實際批評與歷史分析的方法突顯兩百年來英國文化論述的階級性，目的在導正此階級性文化論述的偏頗。威廉士在談到《文化與社會》時，不只一次指出，寫作當時他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觀念與語詞的問題：「這本書是環繞著許多新的問題和疑慮構組的，這些問題和疑慮不僅藉文化的新意義表達，同時也以一整群緊密關聯的語詞表達」（1983: ix）。在《關鍵詞》（*Keyword: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書的〈序言〉（“Introduction”）中，威廉士以相當長的篇幅闡述撰寫《文化與社會》時的困擾：這本書不但難以歸類，其整個計畫還涉及詞彙的應用，尤其是這些詞彙在符碼意義上的歷史流變。「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特色在於它的詞彙，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詞彙並非屬於某個專門學科的專門詞彙。雖然此詞彙與若干學科的詞彙時有重疊，但其範圍包括了一般性的詞彙——從日常生活用法中強烈的、難懂的及勸誘性的語詞，到若干始於某種特定語境而逐步變成描述範圍較廣的思想與經驗領域的語詞」（1983: 14）。

換句話說，這個計畫顯然需要一套不同的詞彙，才能肩負起威廉士賦予這個計畫的政治使命。對威廉士而言，「語言是一種持續性的社會生產」（1981: 176），因此語言——以及語言所負載的文化與政治意義——是變動不居的，這個看法當然與李維思鄉愁式的語言與文化觀難以相容。威廉士表示，「李維思強調語言的文化層面的重要性是對的，但他所持的延續的觀念則大有問題，因為這個觀念抽離了……歷史變遷與逆轉，然後提出意義的單一傳統，這些意義則認可某些當代的價值」（177）。在威廉士看來，李維思所秉持的是一種靜止的語言與文化觀，歷史是停滯的，至少某一社會階級的歷史經驗是停滯的，這是李維思以少數人為主體的菁英主義的歷史與文化觀，而產業

革命之後的整個歷史與文化發展顯然難符李維思的期望。威廉士後來在《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書中批判這種李維思式的文化矛盾：「即使後來社會都已顯著都會化了，其一代以來的文化仍顯著屬於農村；即使進入二十世紀了，在這個都會化與工業化的國度裏，種種舊思想與舊經驗仍明顯持續存在」(1973: 2)。

新的論述必須仰賴一套新的詞彙，同時為了解決語言與文化變遷所可能造成的歧義及其延伸的溝通問題，威廉士整理了一份詞彙，共收錄了六十個詞語，每個詞語並附有註解或短評，準備作為《文化與社會》一書的附錄，並有意稱之為〈產業革命期間英語的流變〉(“Changes in Englis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然而卻不為出版社所接受(1983: 14)。此後約二十年的時間，威廉士陸續蒐集了更多的例子，並為這些語詞撰寫註解或短評。這就是《關鍵詞》一書的成書經過。

按威廉士的說法，《關鍵詞》一書「應該算是一種詞彙的探索記錄：英文裏最常用來討論一般習俗與建制時所共享的一套語詞和意義，我們將這些習俗與建制歸類為文化與社會」(15)。威廉士把這些語詞稱之為關鍵詞，至少有兩個互相關聯的意涵：一方面，「這些語詞在某些活動及其詮釋中是既重要且具有約束力的語詞」；另一方面，「這些語詞在某些思想形式中也是既重要又具有指示性的語詞」。威廉士進一步指出，這些語詞的「某些用法與某些了解文化與社會的方法密切相關」，而「某些其他的用法則在同樣的一般性的領域中開展出某些議題與問題」(15)。這些語詞的政治性即在這裏：它們不僅是論述威廉士所說的文化與社會的主要工具，同時它們在討論文化與社會時還開發了許多新的議題與問題。說得淺顯一點，威廉士的目的在提供一套清楚界定的語詞，讓工人階級也能稍具信心地參與文化與社會的討論——這個心願其實導源於他在牛津大學成人教育班與工人階級學生相處的經驗：

我有個很強烈的感覺，……工人階級的人需要掌握所有處理社會事務的工具。……我故意在書中納進了某些字辭，因為我覺得有的人並不了解這些字辭更有趣、更複雜的社會史，這些人因而在使用這些字辭時信心不足，或者自這些字辭的某些意義退卻，而這些意義曾經是統治階級的報章或政論家強力加諸於這些字辭的。我要讓他們在使用這些字辭時對自己的能力信心十足。（1981: 179）

這正好說明了為什麼《新左派評論》的編者在訪談威廉士時，要把《關鍵詞》一書所激發的知識效應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981: 177）。如果說《文化與社會》是一本質疑菁英主義文化觀，並為工人階級文化張目的書，《關鍵詞》則企圖為工人階級尋找一套可以反映他們的經驗與世界觀的詞彙，整個計畫充分體現語言與觀念的流動性：語言與觀念並未具有普遍與永恆不變的價值的，二者永遠受制於歷史時空，並且恆在改變。《關鍵詞》因此被視為歷史語意學（historical semantics）的產物。

《關鍵詞》的前身既為《文化與社會》的附錄，它的左派李維思追隨者的色彩不言而喻。諾瑞斯（Christopher Norris）認為威廉士早年在劍橋求學時所受的影響也不能忽視——他指的是上文已經提到的瑞恰慈和燕卜蘇。這對師生的幾部影響重大的主要著作——像瑞恰慈的《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以及燕卜蘇的《歧義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等——在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即已出版，對形塑早期劍橋的文學批評貢獻頗大。瑞恰慈提倡實際批評，在方法上強調細讀，重視讀者對文本中字句的反應。威廉士對瑞恰慈與劍橋的實際批評曾經有以下的回顧：

……如果你了解真正的歷史，實際批評這個型態是在二〇年代由瑞恰慈在劍橋的英文系建立的。這個用辭畢竟是他取的。此後在整個劍橋的英文系，實際批評就成了一個確立的步驟。舉例來說，即使在李維思還遭到英文系排拒的年代，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在課程的每一個階段必然維持一份實際批評的報告。（1981: 190-91）

《文化與社會》和《關鍵詞》中所布署的實際批評其實是威廉士在劍橋大學的學術養成的一部分，早在李維思有機會介入劍橋的批評實踐之前，實際批評早已經廣為英文系的師生所接受。諾瑞斯認為對《關鍵詞》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燕卜蘇。威廉士的確在《關鍵詞》的〈序言〉中約略提到燕卜蘇及其於 1951 年出版的《複雜語詞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一書，不過並沒有進一步交代《關鍵詞》與《複雜語詞的結構》之間的關係。這兩本書的最終目的並未殊途同歸，但二者卻建立在頗為相近的對語言的假設上：語言「事實上可以擁有極為廣泛且非常複雜的內在邏輯與語意的含意」（Norris, 1997: 30）。換句話說，了解語詞意義的歷史發展，對了解和解決文化與社會問題是極為重要的。

《關鍵詞》從撰寫到付梓成書，歷經二十餘年，此時威廉士部分影響深遠的著作——包括《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鄉村與城市》，以及幾部討論戲劇與小說的書——業已出版。《關鍵詞》面世後第二年，威廉士又推出另一本重要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至此與他一生的知識工作息息相關的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用伊格頓（Terry Eagleton）的話說——「已然改變了文化園地中世代代的學生與工作者的想法」（Williams, 1989: 314）。《關鍵詞》無疑為文化唯物主義提供了相當詳盡而有系統的註釋，同時也為威廉士此「文化與社會」方法提供了

實際有用的工具。

引用書目

- Dworkin, Dennis. 1997.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 Pr.
- Hobsbawm, Eric. 2002.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London: Allen Lane.
- Leavis, F. R. 1930.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 The Minority Pr.
- Norris, Christopher. 1997. "Keywords, Ideology and Critical Theory." Jeff Wallace, Rod Jones and Sophie Nield, eds. *Raymond Williams Now: Knowledge, Limits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
- Williams, Raymond. 1981 (1979).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Verso.
- _____. 1983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
- _____. 1983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 _____. 1989. *What I Came to Say*.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 _____. 1989.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譯者導讀

「我們要推展民主，／發展『另類文化』，／要讓弱勢者有創造知識的機會／有很多方面／可以向威廉士／和他的朋友們借鏡。」¹ 這個題辭簡明扼要的概述了英國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一生的志業。威廉士精通文藝批評，是當代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亦是英國傳播研究的啓蒙者。1988年去世時，他被譽為：「英語世界中最具權威、最言行一致、最有原創性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英國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家」；「戰後英國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知識份子與文化行動主義者。」

1921年，雷蒙·威廉士出生於威爾斯的勞工家庭。父親是積極、活躍的工會會員，全家的生活都與工人社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高中畢業後獲得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就讀，主修文學。大學時期，對於當時的政治、社會事件及勞工教育保持高度的關注，經常發表與時事有關的政論文章，並且積極的投入由政黨所發起的讀書會活動。大學期間適逢二次世界大戰，被徵召入伍，學業因而中輟。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後，方得重返劍橋，繼續未完成的大學學業。威廉士出身勞工階級，體認到唯有提升工人教育，才能推展社會主義式的民主。大學畢業後，遂將時間和精力完全投入成人教育上。他加入了由牛津大學一些社會主義教員負責的「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從事成人勞工教育，白天準備課業，夜間時分通勤數個地方從事教學；直到1961年被母校劍橋大學延聘為講師時，他才離開成人教育體制。成人教育「對於威廉士來

¹ 這段話引自民國83年12月1日《自立早報》副刊第十一版〈希望之源：英國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士的志業〉中的題辭。

說，重點都是在『重新界定政治』，他認為自己的存在價值在於為造就一個具有參與意識，具有識見的教育公眾而盡心」（敦誠，11）。他的教學首重師生平等討論及學生獨立批判能力之啟發，《關鍵詞》這本書即是他在「工人教育協會」教書時和學生討論後的結晶。《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1958）與《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0）這二本重要鉅著也是在這段教學期間完成的。

如果我們要瞭解威廉士的思想，則必須先瞭解他對文化的看法。威廉士對於阿諾德（Mathew Arnold）與李維斯（F. R. Leavis）所主張的文化菁英主義頗有微詞。他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數的菁英建構，由下層階級或普通百姓接受、體會的菁英文化。對威廉士而言，「文化」這個詞的意含是可以不斷的被擴大，其所指涉的是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學與藝術，也包括各種機制與日常行為等實踐活動；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各個階級共同參與、創造、與建構而成，絕非是少數菁英的專利。他注意到，長久以來英國文化論述皆是從支配階級出發，以統治階級、貴族階級或是中產階級為討論中心，而大部分的工人階級文化則被排除在主流論述之外，未曾受到重視。他洞悉傳統英國文化論述的階級性，認為階級文化論未免失之偏頗，因此他反對任何利用文化觀念來貶抑社會主義、民主、勞工階級、或大眾教育。這即是《文化與社會》一書寫作的背景。

威廉士指出：「即使在一個由某一階級為主的社會裡，其它階級的成員對一般共同資產顯然也可能有所貢獻，而且這些貢獻可能不受支配階級的觀念與價值的影響，甚至還與之對立」（《文化與社會》，353）。他對大眾化的電影、廣告、媒體、流行音樂與通俗文學抱持著肯定的態度，認為這些屬於大眾文化的東西是建構工人文化經驗的重要部分。整體說來，威廉士的文化觀是立基於文化物質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強調文化的物質基礎。這種文化觀摒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基礎與上層結構的從屬關係：基礎既未決定

上層結構，上層結構也未反映或複製基礎」(李有成，29)。對威廉士而言，「文化物質主義不會強調文化的自主性或超越性，也不會將文化貶抑為經濟與社會實踐的附庸。具體而言……文化從來就不是真空的存在，可以抽離其它的社會實踐」(李有成，29)。

《關鍵詞》原是屬於《文化與社會》一書的附錄部分，後來分離出來，獨立成書。第一版是在1976年發行，1983年的第二版收錄了更多的詞彙，且做了一些修訂與補充。威廉士在〈導言〉裡，對於《關鍵詞》得以付梓的過程做了一些感性的說明。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從陸軍退役回到劍橋繼續大學學業。僅僅四年半的時間，他強烈感受到一種陌生、驚異之感。他察覺到語言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差異性 (social differences) 及不同的價值觀，並且注意到在政治、宗教、經濟等領域裡，某些重要的觀念有顯著的改變。威廉士指出：在語言演變的過程裡，某些語詞、語調、節奏及意義會被呈現、察覺、檢試、證實、確認、肯定、限定與改變；演變的過程中，有時候是非常緩慢的，有時候可能是非常快速——例如在戰爭時期，這種過程可能非比尋常的快速並且極易察覺 (“Introduction,” 10)。《關鍵詞》一書即是探討各關鍵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字義的變化，以及彼此間的相關性、互動性。在〈導言〉裡，威廉士以「文化」(culture) 為例，探討這個詞在戰前與戰後——一九三〇年代與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意涵的轉變。戰前，「文化」具有二層意涵：一方面它代表一種「社會優越」(social superiority) 感，另一方面它是一個常用的詞，用來表示詩歌或小說的創作，電影製作、繪畫，及劇場工作等活動。戰後，這個詞則被用來指涉價值 (values) 的形塑過程 (這也是文學本身所要強調的)；另外它也指涉一種特別的生活方式，與「社會」(society) 一詞的某些用法接近。威廉士當時對「文化」一詞在用法上的改變感到相當困惑，於是他戮力思索，將其聯想到其它相關詞彙：「階級」(class)、「藝術」(art)、「工業」